

# “国魂”与“新民”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国民性的思考

张 敏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 在 20 世纪初年兴起的改造国民性思潮中,思想启蒙家们批判了存在于国人身上的种种劣根性,大力提倡新的国民意识,积极探讨了“新民”的途径与方法,并把理论探索付诸实践。

**关键词** 国民性 知识分子 国魂 新民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94(2006)11-161-01

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新旧体制更替过程中会产生这样“两种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旧的并不废去,即是孱杂”。即是说旧体制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旧的社会心理,使得新的体制很难将自己的根须扎进社会的深处,辛亥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原因大抵也在此。

学西方改造中国是贯穿近代中国历史的重大课题,深入到精神世界的研究,“国民性”成为几代知识分子思考的主题。“国民性”亦可称作“民族性”,是由日语引入的名词,意为一国或一民族的全体所共同具有的心态文化特征。最早从事对中国国民性观察与研究的是一些外国人,如英国人亨利·查尔斯的《中国和中国人》(1849年)、法国人古伯察的《中华帝国追想》(1854年)、美国人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1894年)等等,其中不乏种族主义的偏见和对中国人民的污蔑和歪曲,研究动机也主要是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殖民地统治服务。然而,这种观察和研究对中国近代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促使他们站在受欺侮、受奴役的民族立场上进行自我反省,从中西文化所铸造的“国民性”的差异来理解中西社会历史进程、政治制度的差异。

由于中国的封建文化十分发达,中国的士人在对待外来文化上往往习惯于盲目自尊,以至在近代中外关系的突然逆转中猛醒过来的有识之士陷于那么深层的痛楚和深刻的反省之中,才使他们由批判中国固有的经济、政治制度逐步深入到怀疑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抨击处于文化深层的落后国民性。所以,国民性问题的提出一个最直接最根本的诱因在于中西方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较量。对国民性愚昧的鞭挞,对传统文化的挑战,乃至对“国魂”和“新民”的呼唤,是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近于一致的思想倾向。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无论改良派或革命派的报刊,都发表了大量批判国民落后性和奴性的文章。如改良派的梁启超,革命派的邹容等。由于国民性问题是中西文化比较和冲突的产物,所以他们在论述中国国民性及其根源时,都以西方政治、文化为参照物。中国人的奴性、旁观、无自由民主观念、无冒险精神,是相对于西方人的独立、有自由民权思想、社会主义感强、尚冒险开拓等而言的。中国长期专制,孔教独尊,忠孝不易等,也是比较于西方的民主传统、学术自由、独立人格等政治伦理文化特点而提出的。与此相应,在呼唤新国魂,塑造新国民的模式时,改良派和革命派也无不以西方国民为范本。首先,他们以西方为例说明国民程度对民族兴衰的决定作用,强调新民、新国魂为改造中国所必不可少。他们认为,西方之盛,在于国民性强;中国之衰,在于国民性弱。非改造国民性无以救中国。梁启超说:“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政息焉,……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遇有暴君污吏,虐文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英美各国就因为国民程度高,故“常不得贤君相而足以致治”。革命派也提出“民族之兴而盛修而衰,回环反复兴废靡常者,皆其精神之强弱为之也”。他们叹中国民族精神之衰微,呼吁铸造新国魂,使“新国魂出现而中国强矣。”其次,他们以西方国民性为借鉴,提倡发扬中国民族精神之华,补以他国国民性之粹,以此作为铸造新民新灵魂的理想模式。反映革命派愿望的《国民新灵魂》一文,提出先招“中国魂”之归来,然后“旁求泰东西国民之粹,囊之以归,化分吾旧质而更铸吾新质”。《新民说》则概括为“一曰淬历其本所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本所无而新之。”可见,如前所述,关于国民性的思考,是民族危机的直接产物,直接服务于救

亡图存的政治目的,即国民性一开始就与政治运动纠合在一起,重在宣传而非学术价值,这决定了问题的复杂性。

关于革命与否的政治论战以革命派获胜而告结束,但在国民性改造问题上,革命派却未能战胜改良派。在现实面前,孙中山也不不得不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修正。他说,中国人的奴性不是一下子就改得了的。我们要根本上改变他,便要想法子去感化他。感化就是宣传。他认为宣传的效力比军事的效力大,号召每个党员都负得起宣传的义务。

辛亥革命未能使国民性得到彻底改造,宣传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意识形态本身的特点和规律所决定的。在清王朝的封建专制政体和旧文化的双重束缚下,国民性的改造是政治革命和宣传教育两者兼顾,缺一不可。从 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把近代文化反省和启蒙引入了一个更深的层面,即从传统文化深层心理结构中探寻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改革的悲剧性命运和文化现代化运动步履迟缓的根由,这同时也是中国人新文化素质和理想人格重构的起点。

谈到国民性改造不能不涉及鲁迅。有如郁达夫所说: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别无捷径。在对“国民性”批判的深度、广度和高度方面,鲁迅堪称前无古人,后少来者。他的贡献在于,对于国民劣根性的研究、揭发、攻击、肃清,终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他的创作和翻译约共六百万字,大都是他针砭民族性所开的方剂。20 世纪初叶,在一大批流亡日本的热血沸腾、充满激情的革命党人致力于“反清复国”的种族革命的同时,青年鲁迅却不满足于“种族革命”的偏狭,开始了对“反清以后,如何治国”这一更深层问题进行思考,如“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等等。他把中国的前途与民众的觉悟、新人的塑造联系起来思考,“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万事举”。鲜明的“立人”意识,即把改造传统旧人,塑造现代新人的任务放在社会改革大业的首位,这是鲁迅超迈同时代人的卓识远见,也构成他文化启蒙的核心。

陈旭麓先生曾说过这么一段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启封建之蒙,启传统之蒙,对冲破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淀而成的、已渗入骨髓的凝固化的文化潜网,对植根于传统小农社会的观念意识和伦理精神的根本性改造或创造性改造转换,是比救亡、革新更艰巨的任务。一个时代需要一个时代的国民,近代文明总是与近代国民的理性觉醒相伴而行,用滞留于中世纪的国民来推行近代文明的发展和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不冲破封建之蒙、不否定传统之蒙,近代化就缺乏现实的可行性,就缺乏能够赋予近代国家制度、管理体制以真实生命力的社会心理基础。”所以,中华民族不仅需要以十倍的勇气去超越外在的制度文化、器物文化方面的关山阻隔,更需要以百倍的自觉去剔除心态文化方面数千年历史积淀所结成的层层污垢,方可以在完全的、彻底的意义上走出中世纪。

**注 释:**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414.

梁启超.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87.

洋溟.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1:365.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79.

陈旭麓文集(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409.